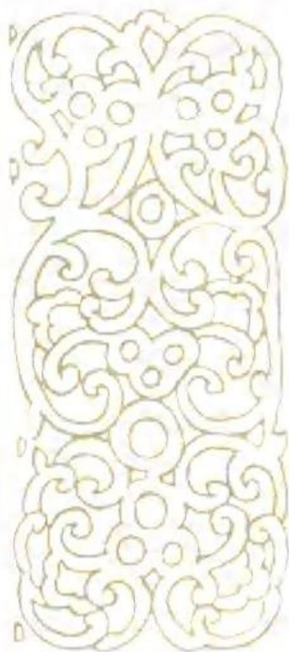


西北师院中文系
现代文学研究室编

作家选论 中国现代



人民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亦君

封面设计：钟 嵘

中国现代作家选论

西北师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200,000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6-00363-5/I·133 定价：2.70元

目 录

鲁迅

论“为人生”的鲁迅小说……支克坚（1）

《阿Q正传》与新文学

的现实主义问题……支克坚（27）

郭沫若

读《三叶集》二题……孙克恒（53）

《女神》论……孙克恒（60）

时代精神与诗人的创作个性

——读《女神》中的《湘累》

……孙克恒（80）

闪光的破碎的爱：《瓶》……孙克恒（88）

叶圣陶

略论叶圣陶的文学道路……万 嵩（95）

叶圣陶短篇小说的讽刺艺术

……万 嵩（115）

叶圣陶童话的历史地位……万 嵩（131）

茅盾

一个反动工业资本家的艺术典型

——对吴荪甫形象的评析

……赵开泉（146）

夜气压重楼 茅公笔更遒

——重评《腐蚀》……………赵开泉(165)

曹禺

曹禺剧作思想的几个问题

——兼论曹禺的前期世界观……………李树凯(185)

紫漪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李树凯(208)

丁玲

新文学交响乐中一个跳动不安的音符

——论丁玲及其创作的精神特征……………于河生(226)

丁玲小说的创作特色及艺术创新……………于河生(254)

登高山观日出 在海上看激浪

——丁玲散文的艺术风格……………于河生(273)

后记……………(291)

《紫漪》重评……………

曹开泉(165)

论「为人生」的鲁迅小说

支
克
坚

——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鲁迅小说思想和艺术的基本特征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现代新文学最重要的传统，是它的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传统，鲁迅则是这一传统的开创者。事实究竟怎样呢？诚然，阶级社会里的文学艺术，多数情况下，都是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反映着一定阶级的利益，一定阶级的愿望，一定阶级政治的或其它的（比如道德的）主张。但对于文艺来说，这样还不等于从属于政治；所谓从属于政治，应该是指它明确地以宣传一定阶级的实践的政治路线为自己的任务而言。而人类历史上任何意识到自身特殊利益的阶级，虽然都可能有一种或几种政治主张，它形成自己实践的政治路线的过程，却总是跟它以一定的方式，把自己组织起来的过程相伴随的。因此，文艺从属于一定阶级实践的政治路线，同时必须从属于这个阶级的某种形式的组织。没有前者，后者不过空话一句；没有后者，前者

又将失去保证。我们曾经要求文艺成为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其中正好包括了这两种从属。这里前提是革命机器的存在和运转。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无论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的时候，还是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的时候，这样的前提都还不具备。《新青年》的团体究其实不过是一个思想文化方面的组织，远非具有能够动员人们一致投入实践的政治路线的阶级组织。中国现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机器，这时刚刚开始构造，还没有造成，没有正式开始围绕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实际斗争这根主轴运转。因此，用鲁迅1935年关于《新潮》小说作者的一段话，来说明新文学最初的传统，反而贴切得多。他说：

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用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①

做改革社会的器械，和从属于政治决非永远是等号。社会改革的含义，要比政治宽泛得多。它或许是为了政治的目的，或许并不；可以采取政治的手段，也可以不采取。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改革，最终当然是靠了政治才得以解决问题。新文化运动时期其它改革主张，后来要么发展为政治斗争的主张，要么被历史所否定或者暂时搁置起来。然而，这些主张，不仅是我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

^① 《鲁迅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革命过渡时期必然的或难免的产物，它们中间有的还确曾帮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客观上促使人们走向政治斗争，从而在历史上起到了重大的进步作用。鲁迅曾说，他做小说时抱的是“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①。这句话正表现着他当时关于社会改革的具体主张，可以看做他对文学怎样充当改革社会的器械的解释。

“为人生”也是一个含义极其宽泛的概念。当时不光鲁迅，许多人都这样主张。多年来，我们致力于说明鲁迅跟新文化运动其他一些代表人物的区别乃至对立，而无视他们主张的一致方面——其实这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很不够的。胡适1922年曾给予鲁迅小说很高的评价，以为“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②，就是一个证明。事实上，鲁迅把“为人生”跟启蒙主义联系在一起，表明它跟当时周作人所提出、得到广泛响应的“思想革命”的口号，有着相通的含义。“思想革命”也罢，启蒙主义的“为人生”也罢，都和政治斗争的主张不同，其着眼点，还不在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它们批判的锋芒，直指传统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主要是因为这些中国的“国粹”，几千年来从精神上和肉体上，首先从精神上毁灭人。这是它们揭露的重点，同时它们又努力寻求人的价值，特别是人的精神价值。所谓人生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怎样对待生活，用什么样的

^①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②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态度对待生活。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的长期统治，使得中国人对一种极端不合理的生活采取了极端麻木的态度。启蒙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就是力图在这个问题上，唤起他们作为人的自觉，对人的价值、特别是人的精神价值的自觉。当然，这跟否定旧生活、追求新生活不可分割，否则它就纯粹属于精神范畴，属于唯心主义，不具备任何唯物主义的因素了。但这里所谓新生活，也只能是一种虽然摆脱了传统的影响，却不免朦胧、抽象的想象中可以实现人的价值的生活，不是指由新的阶级代替旧的阶级进行统治。

我们自然仍旧必须看到鲁迅跟新文化运动其他代表人物的区别。还要看到他跟稍晚一点的新文学作家的区别。同样主张“为人生”的作家，关于究竟什么是人的价值，什么是人的精神价值，认识极不统一。当时出现了“爱的哲学”一类虽不失其崇高的一面，却未免过于虚无飘渺的人生哲学。也有人把个性解放同个人主义混为一谈，视个人享乐为人的价值之所在，实际上走向了对真正的人的价值的否定。鲁迅不仅跟后一种根本不同，比前一种也高出许多。他说：

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①

把这段话跟鲁迅当时许多关于人的话放到一起，我们不难发

① 《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现，鲁迅是从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出发把“内心有理想的光”的“革新的破坏者”，当作了真正的人的标本。在鲁迅看来，人的真正的价值，就在于同那寇盗和奴才的思想和心理决裂，怀着革新的理想，为破坏传统的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破坏由这些造成的黑暗社会，创造合理的美好的新社会而奋斗。这也就是鲁迅向读者展示的一种新的人生。而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对人或人的精神的毁灭，又正在于使他们丧失了任何真正的革新的理想，相反时时堕入寇盗和奴才一流。在这点上，鲁迅对中国古老传统的揭露，要比当时许多人准确、具体和深刻。它最充分地显示出了鲁迅关于人和人的价值的思想的崇高的性质。在新文学还是以要求人性解放为其思想基础的时期，在创作实践中，鲁迅最明确、最彻底地把人的价值问题同社会改革问题结合在一起。鲁迅启蒙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的特点正在这里。他的小说，也因此成为开创新文学作为改革社会的器械的传统之作。

弄清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看看究竟应当怎样具体理解鲁迅的小说。

二

我们现在常常说，新文学一个重要的优点，是它一开始——从鲁迅开始——就十分重视反映农村生活。有的研究者更认为，鲁迅当时已经能够把农民问题，作为中国近代和现代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来认识。其实，这些都是在中国革命经过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胜利，我们在政治上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之后，才有可能提出来的看法。在此之

前，在二十年代中期新文学发生转变之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人不理解鲁迅小说描写农村的意义。成仿吾1924年写的《〈呐喊〉的评论》，就表现着这种情况。成仿吾这时的文学主张已经带上了“为政治”的色彩，他的眼光又受到了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政治斗争本身的限制，以致他不能正确地来看待那些描写跟作为政治斗争中心的城市时时变动的的生活相比，乃是处于停滞状态的农村生活的作品。正是为此，当年胡适肯定过的鲁迅小说，反而遭到了否定。

事实上，倘使鲁迅当时持“为政治”的文学主张，他大概也不会对远离中国政治漩涡中心的农村发生这么大的兴趣；他之所以如此，怕正好是跟他“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有关。一般来说，启蒙主义的“为人生”的主张，引导着人们把目光转向社会下层，转向被压迫者。至于鲁迅，他既然把“为人生”同“思想革命”结合起来，那更有一个透彻地认识传统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所造成的中国的人生的问题。而最纯粹的中国的人生，丝毫没有受到1840年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一切方面都还表现着古老的中国传统的人生，是农村的人生，包括农民的人生。传统的各种特点，一切危害，集中表现在这样的人生上。对此，再没有比鲁迅看得更清的了。可以说，这是鲁迅目光凝视中国农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同时，在中国，最痛苦的人生，也是农民的人生。鲁迅说过，他所了解的中国农民，乃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①。农民所受的压迫，有精神压迫和肉体的压迫；他们的人生的苦痛，就是由这两方面的压迫造

^①《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成的。农民的人生得不到改良，整个中国的人生也就得不到改良。这是使鲁迅把注意力放在农民身上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

《呐喊》里几篇写农民的小说，都是非常典型的“为人生”的作品。《故乡》描写了农民闰土的命运。如果是“为政治”，那它虽然不一定非正面具体描写阶级的压迫不可，却无疑会在这方面多花一点笔墨，但它对此只用了一句话来概括：“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这句话，把各种政治的非政治的因素放在一起，作为那个社会里决定农民命运的东西。鲁迅着重描写的是闰土前后精神状态的变化，然而又并不直接涉及阶级意识、阶级觉悟一类问题，主要是表现了闰土怎样从“活人”变成“木偶人”。鲁迅通过这显示了当时中国社会里一个农民的人生，“活人”最终不免变成“木偶人”的人生。这一变化的过程，也就是闰土的人的精神丧失的过程。小说里少年的“我”的眼睛所看到的“小英雄”闰土，生机勃勃，本来完全可能成长为真正的人。但可能性并未变成现实性。岁月不仅没有增添闰土同环境奋斗的能力，为自己，为别人争取一种比较合理的生活的能力，反而剥夺了他这方面的能力，使他在现实面前，陷于彻底的被动。旧人生的特征，旧人生的弊病，就是这样得到了深刻的表现。

表面上看起来，闰土的变化，跟传统没有多大的关系。其实，在从多子到官、绅等各种因素的背后，一个决定的因素，是传统的因素。如果不是这个因素起作用，生活里的“苦”，也有可能使闰土走别样的路，不一定非使他成为“木偶人”不可。这一点，小说是初看，似乎不见痕迹，实际

却有极为分明的表现的。比如，其中所描写的闰土重新见到“我”时的情景，就再清楚不过地向我们显示了古老的传统是怎样紧紧地束缚着闰土的头脑。鲁迅寄希望于下一代——水生和宏儿。他希望他们不再彼此隔膜，建立人和人之间正常的关系，而这是以有合理的人生为前提的，是合理的人生的一部分。为此，他希望他们不再辛苦展转、辛苦麻木或辛苦恣睢而生活，这些尽管是极不相同的人生，却都不是合理的人生。改良人生的问题，于是尖锐地摆在了读者面前。

被称为鲁迅小说代表作的《阿Q正传》，“为人生”的特点更加明显。鲁迅自己就说过，这篇小说，写的是“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而且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的人生，“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的外国读者也许会作别样的理解的人生^①。目前关于它的争论，许多时候，是由于某些研究者不了解它“为人生”的特点，或者把“为人生”跟“为政治”混为一谈所致。《阿Q正传》对当时中国农村阶级状况和阶级压迫的描写，自然要比《故乡》以及作者其它描写农村的小说都具体得多，但鲁迅在小说里，仍旧不是把展开这种阶级关系本身，而是把表现阿Q在当时的阶级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中精神状态的极端麻木，即阿Q的精神胜利法放在首位。不能把阿Q的精神胜利法看作抽象的东西，看作可以装进任何内容去的仅仅是形式的东西，它是具体的，以特定的形式表现着特定的内容。不管阿Q“革命”前对赵太爷、钱太爷“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

① 《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奉”，想着“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也罢，“革命”后晚上睡在土谷祠里做那样的梦也罢，都表明他对现实的社会关系的不合理性没有那怕是一点点怀疑，不谋求那怕是一点点改变，只不过幻想换一换自己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的位置而已。也就是说，阿Q内心里没有任何真正理想的光，跟那种革新的破坏者丝毫无缘。倘使不是如此，他就会实行真正的反抗，而不致从精神胜利法中求得解脱了。所以，在鲁迅看来，阿Q的精神胜利法，跟真正的人的精神，是根本对立的，它本来就是阿Q的人的精神被毁灭的结果，阿Q的悲剧因此也是他人的精神丧失之后的悲剧。

《阿Q正传》也因此确确实实成了鲁迅小说的代表作。因为，它标志着“为人生”的鲁迅小说思想上和艺术上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它也标志着当时整个“为人生”的文学思想和艺术上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它最明确、最彻底地把人的价值问题同社会的改革问题结合在一起。失去了人的精神的阿Q，当着社会变动来临的时候，不仅不能成为内心有理想的光的革新的破坏者，反而表现出了寇盗和奴才的特点。而后者是不具备什么人的价值的；只有前者，才具备真正的人的价值，才能使社会真正有所改革。阿Q典型当然又是对传统的极为深刻的揭露。鲁迅的看法非常坚定，他认为，中国古老的传统，到了现代，已经跟真正要改革社会的主义和理想，水火不相容。因此，它也不可能推动中国人赶上世界的潮流，相反只能给我们民族带来象锡兰Vedda(味达)族那样的灭亡的命运^①。现代改革社会的主义和理想，要从外国找，向外国学，自然

^①见《热风·人心很古》。

必须实行“拿来主义”。阿Q，就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外国的主义和理想的影响，而传统的熏陶，却使他具有了寇盗和奴才的气息。鲁迅在小说里，反复写到他的思想“样样合乎圣经贤传”，他“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等等，都是为了通过否定阿Q的愚昧性格来否定传统。倘使嫌“传统造成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样的提法过于简单，那也必须承认，这种精神胜利法，跟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是传统使得它不可克服，最终还导致了阿Q肉体的毁灭。这就是传统给予阿Q的人生。弄清了《阿Q正传》思想的这个特点，弄清了它的的确确是“为人生”的作品，我们就不至于再花费力气，去寻找阿Q形象所包含的农民的“革命要求”。

三

有的研究者怀疑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已经具有新的特征，因为这些小说没有向读者指明出路。他们并非毫无根据，本来，揭露了社会的矛盾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常常是旧的或者说批判的现实主义的特征，它似乎确实不应当继续成为新的或者说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特征。但如果比较具体和深入地来谈问题，那就应该说，这里往往更主要的是表现着“为人生”的文学同“为政治”的文学的区别。

指明出路或指示未来，是政治对于文学的要求，是“为政治”的文学特点。政治，不管有无某种包含着远大目标的主义做基础，都始终是一种有着具体目标的实践，因此，它总是要求文学宣传自己的目标，帮助自己实现这一目标。一切从属于政治的文学，也都以此为责任。三十年代有

人说：“‘暗示的出路’便是革命文学的活力，没有这个活力，便不成其为革命文学。”他们实际上是把“出路”当作革命文学的灵魂的。

照这种要求，鲁迅的小说，虽然写在几年或十几年之前，仍旧不能容忍。因为，它们不仅没有明指或暗示出路，相反常常向读者表明生活没有出路。象《孔乙己》以“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结束，《风波》以生活的停滞、六斤重复先辈的命运结束，都是典型的例子。然而，这样来收尾，正好把鲁迅小说“为人生”的特点显示出来了。须知严肃地来表现有关人的价值、特别是人的精神价值的主题，要比表现某个具体的政治目标的实现，或者人物对某种具体的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态度变化，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尽管革命的政治目标的实现，也总是关系着人的精神的恢复和发扬，人的价值的实现，后者仍旧是一个更加深刻、有时又比较抽象的问题。而艺术反映生活却需要具体，抽象往往是它的大忌。因此，鲁迅当时，便主要采取否定的方式，通过否定表现出自己的理想来。这里局限肯定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谈这些作品的局限的时候，不应该仅仅拿它们采取了否定的方式这一点做根据，而应该以它们关于人的价值、关于人的精神价值的理想的性质为根据。一般说来，启蒙主义的“为人生”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基础；但是，一旦理想出现了新的因素，它也可以成为某种类型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思想基础。

有的研究者为了赋予《孔乙己》以它本来不具备的政治的意义，抓住其中“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一个人”这句话，认为鲁迅是通过孔乙己的形象，提出了知识分

子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科举制度使得知识分子不能拿短衣换长衫——走向人民。但这里存在着几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孔乙己究竟能够走向什么样的人民？他如何走向这样的人民？走向了这样的人民之后又怎样？根据小说所描写的那样的社会，根据孔乙己所处的具体环境，这些问题，都是无法回答的。其实，鲁迅原本就没有提出这些问题来。孔乙己的形象，一方面，固然表现了象他这种封建时代的下层知识分子，试图缘着科举制度爬上去而终于失败了的知识分子，和当时社会其他下层人民一样，有着悲惨的命运；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的，更加主要的，是表现了孔乙己这种所谓“读书人”，即比其他人更多地接受了传统的思想文化影响的人，笃信传统的思想文化的人，恰恰最不可能起来同环境奋斗，最缺少同环境奋斗的能力，甚至连在那样的环境里立足也做不到。而这又是由于传统毁灭了他的人的精神。同环境奋斗，需要理想，需要勇气，需要力量。假使对孔乙己来谈这些，岂非离题太远么？要知道，传统给予他的，完全是相反的东西。所以，《孔乙己》的主题，也一样是关于人生的主题。小说中的“我”，那站在曲尺形的大柜台里的小伙计，一面温酒，一面睁大眼睛看人生。他看到的便是孔乙己这样的人生，一种使那些丝毫没有人的觉醒的人感到“快活”，却使有了人的觉醒的人感到凄凉和心酸的人生。写出这样的人生，告诉读者它应该跟那个主人公一起死去，同时也就表现着鲁迅对一种新的人生的向往和期待。鲁迅写这篇小说的目的至此已经达到了，他没有必要再来为孔乙己及孔乙己们指示什么具体的路。

从政治的角度来要求，《风波》更加应当描写人物的觉

醒和反抗，向读者指明出路或指示未来，因为它以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辛亥革命之后的张勋复辟——为背景，写的又是农民。但正好是通过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相反的结尾，鲁迅把小说的主题，一下子集中到中国劳动群众人的精神丧失和恢复的问题上来了。研究者们都认为，鲁迅在《风波》还有《药》、《阿Q正传》等小说中，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当然是事实，问题是还需要深究一下，鲁迅所批判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究竟表现在哪里。辛亥革命不是一场推翻地主阶级统治的革命，孙中山当时提出而实际并未实行的“平均地权”的口号，也还没有包括立即消灭地主阶级的要求在内。辛亥革命作为反封建的革命的不彻底性，应该说主要是表现在这里。但鲁迅至少没有明确地从这方面对辛亥革命提出批判。他所揭露的，恰好是辛亥革命对许多人来说，不属于那种有主义、有理想的革命（在这一点上，《药》里的夏瑜是个例外，然而夏瑜不过是一般的民主主义战士，还不是阶级斗争的战士，他的口号是：“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它也没有能够造成有主义、有理想的人（在这一点上，《药》的描写和其它几篇小说完全一致）。因此，辛亥革命没有带来中国人生的改良，社会的改革。李大钊在谈到劳动教育问题时说：“凡是一个人不愿脱去黑暗向光明里走的，人生必须的知识就是引人向光明方面的明灯”^①。鲁迅笔下的农民，被剥夺了享有这些知识的权利，被剥夺了脱去黑暗向光明的可能性，辛亥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都是如此。《风波》的结尾，正表明了这种情况。

①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